

散文

母亲

田瑛



山径旁的花独自开着,在无人经过的时辰里舒展到极致。我望向它,忽然想起走在人群中的母亲——她不言不语地生活在山冲里,可与那里的女人,总隔着一层透明的距离。

无论放到哪里,她身上都会洋溢出一种与周遭格格不入的贵气。不是金银堆砌的那种,而是骨子里透出的洁净与秩序,像宋画里留白的部分,寂静里自有山河。

乡下的房子是黄土夯筑的,墙上有雨水流过的痕迹。母亲每日清晨拖地,清水一遍遍浸透土坯,久而久之,地面竟泛出青瓷般温润的光泽。村里人串门,总在门槛外跺脚,说:“你们家地亮得照人,不敢踩。”

别人家是热闹的——农具靠在墙边,稻草屑在空中飘,孩子的衣服搭在椅背上,生活的声响与痕迹毫无遮挡。我们家却不同。母亲将日子过成了宋时庭院的格局:一桌一椅皆有位置,碗筷摆得端正,连晾在竹竿上的衣服,肩线都对得齐齐整整。

还记得童年睡的雕花木床上有许多鸟雀,它们在那里叫了几十年。母亲每天用湿毛巾擦拭,那些暗红的漆面便泛出一种说不出的光。村里妇人的床铺上,常散落着碎布头、线团,被褥里裹着人的浊气。我家的床,麻布蚊帐永远平整地压在雕花帐板下,无论铺的是草席还是竹席,边角都熨得帖帖的。

最难忘的是一张草布席。乡下席子睡久了,中间总会磨出洞来。别人家要么将就,要么换新。母亲不。她将破洞处小心剪去,又从旧床单上裁下尚且完好的部分,一针一线补上去。补丁与原来的席子长在一起,竟成了别致的纹样。

有讲究的客人见了,摸着席子问:“这花纹特别,哪儿买的?”

“俄罗斯买的。”那时中俄关系正亲密,村里人听说过“苏联老大哥”,却不知道俄罗斯在哪儿。她们更不知道,我的母亲生我们前在城里工作,还是县里第一批学开拖拉机的姑娘。她握着方向盘驶过尘土飞扬的上路时,大概也不会想到,自己日后会在黄土屋里,把一句玩笑话说得那样平静。

问的人信了,点点头,又说:“怪不得,洋气。”母亲的幽默是冷的,像井水,表面平静,底下却藏着整个夏天的清凉。她从不解释,任由那些话语在村里流传。后来有人说,田家的女人用词都是外国货。

母亲的床,谁也不许随意坐。她不曾明说,可每当有邻居来聊天,不意意靠上床沿,第二天,床单必已洗净晾在院中。阳光穿过麻布,透出清淡的皂香。

那是上海肥皂的味道。浅黄色的长方体,用牛皮纸包着,在供销社的柜台里要凭票才能买到。母亲用

它洗衣、擦身,甚至放在衣橱里。于是整个家都浸在那股幽香里——不是花香,不是脂粉香,是干净的、理性的、带着距离的气味。母亲从那里走过,那香气便跟着她,成为她身体的一部分。

她醒得总比鸡鸣早。天还灰着,就提着马灯去田头看水。回来时,扁担在两肩轻盈地颤,桶里的水清亮如镜。母亲说:“要挑最早的水,晚了,水就浑了。”

别人家开始炊烟升腾时,母亲已收拾完院落,坐在晨光里梳头。她的头发永远一丝不乱,在脑后挽成圆髻,用黑色的网兜罩住。于是当村里妇人忙得鬓发散乱时,母亲总显得清闲——她只是把时间往前赶了半步,或者,往后挪了半步。

我是老四,下面还有个弟弟。家里做事,姐姐们总是抢在前头,得了麻利能干的名声。我慢,躲在后面,看母亲怎样把抹布拧得不干不湿,看她怎样将晾干的衣服叠出棱角。那些旁人忽略的细节,我都看在眼里。

后来我离开村庄,在城里工作。办公室的玻璃窗要擦到看不见玻璃,文件按日期排列得像书页,工作计划总要提前想好三步。起初我们的办公室在车间,我管文明生产,我去了,那里有了文明生产管理,我们几个女人的办公室,总是弄得比机关的还整洁干净。有人说我有洁癖,我说不是,是母亲,在照我。

后来忙碌,只要听到母亲来我家,我都会用心收拾,生怕她哪里不舒服。可母亲对我是包容的,她说,我工作,带娃,还有老人要伺候,可以随意点……

我心里非常清楚,我早已在另一条路上与母亲遥遥相随。我们共用同一套生活的语法:简洁、有序、留白。她用在黄土屋里,我用水泥格子间;她经营的是三餐四季,我经营的是车间管理和报表会议。可底下的东西是一样的——对混乱的本能抗拒,对残缺的从容修补,在有限中开辟无限的耐心。

母亲87岁了,不见一根白发,头发带卷,梳得整齐。她领我到她的房间,被套折叠整齐,散发杀菌凝露洗的香味,我闻了闻,问哪里买的,比蓝月亮好闻……她拿出一个盒子,一粒粒晶莹剔透的洗涤丸,还有防串染吸色片给我看,我瞬即下了一跳。

我忽然明白,母亲一生所做的,不过是在尘土飞扬的人世间,固执地划出一块干净的地方。这干净不是逃避,而是一种深情的抵抗。

母亲不到五十岁就回了城,她的精致,没有几个城里婆婆能敌。没有人知道她来自农村。

早几日,与母亲在冬日暖阳下散步,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,一直延伸到我的脚边。我们的影子重叠的部分,分不清哪是她的,哪是我的。或许本来就不必分清——有些东西,就是这样在无人注意的路径上,静静地完成不同的传递。

随笔

人到中年 须习减法

殷良良

人生行至半途,常觉步履渐沉。仿佛当初那只轻便的行囊,已在不知不觉间塞满杂物,臃肿难负。其中所装,有名利场中逼来的,有世俗眼光赋予的,也有自己在迷惘中匆忙拾起的。于是,中年之后,当学做减法。这并非颓唐,而是生命历经春耕夏耘后,走向另一种饱满的智慧。

减去“应酬”与“面子”,回归生活本真。中年时光,忽然格外珍贵。那些推杯换盏、言不及义的人际,那些为维系虚幻人脉而疲于奔命的周旋,恰似华服之下的虱蚁,悄然啃噬所剩无几的精力与热忱。减去它们,不是疏离人间,而是懂了选择与珍惜。真交情,往往存于三两知己的清淡相处中,存于夜深灯下的默默相伴里。同样该卸下的,还有那副名为“面子”的重担。我们曾为它强撑门面,活成他人眼中的角色;如今终于领悟:踏实的事业、深耕的专长、内心的安稳,远胜过浮华的标签。褪去这层外壳,生命才得以自在呼吸。

减去“喧哗”与“他者”,重获内心宁静。年轻时的热闹,是向外探索世界的触角;中年后的安宁,则是向内安置灵魂的归处。减掉不必要的嘈杂——无论是外界的纷扰,还是心头的喧嚣。开始享受独处,在一本书、一杯茶、一段安静的散步中,与自己真诚相见。这份静,不是贫乏,而是精神世界的留白,容思想沉淀,任灵感生长。更须勇敢减去的,是“为他人而活”的惯性。半生已付,我们曾为父母、子女、伴侣乃至世人的目光倾尽心力。此刻,该把那一束温柔的光,轻轻转向自己。这不是自私,而是深刻的自觉——唯有内心丰盈、自成源泉,才能给予他人更饱满、更绵长的爱。

减去“久坐”与“追逐”,找回身心平衡。身体是灵魂的殿堂,行至中年,更需悉心养护。告别久坐伏案的习惯,让身躯重新流动。适度运动,不再是挑战极限的证明,而是与身体和解的仪式,是保持生命活力的朴素方法。在这点滴的自我关照中,我们学会聆听身体的低语。与之相应,内心也需松弛。放下对名利的过度追逐——那是一种望不见终点的跑道,常让人迷失方向与快乐。中年的美好,恰在于把向外奔逐的劲头,转为朝着内心与梦想的深耕。那梦想或许不大,却源自真诚的爱,能带来深沉的满足与生命的价值感。它让我们懂得:人生的意义,不在于拥有多少,而在于是否活成自己由衷欣赏的样子。

说到底,中年这场“减法”,是一场深刻的回归。它不是退却,而是战略性的聚焦;不是失去,而是为了更丰盈的获得。当我们一层层卸下那些本不属于生命的负重,终会惊喜发觉:那个最本真、最核心的自我,原来如此澄明而有力量。就像一棵秋树,主动抖落满身繁华的叶片,并非走向枯寂,而是将养分深藏根脉,静候下一季春天,更从容、更茁壮地新生。

小小说

货车司机

王辉

男孩坐在路口的石墩上,看着公路上汽车一辆接一辆从眼前驶过,望不到头也望不到尾。这些车,究竟从哪里来,又要往哪里去?为什么它们从不肯稍稍停歇?爸爸会不会就坐在其中的哪一辆车上呢?

男孩的父亲是个货车司机,常年在外奔波,十天半个月也回不了一趟家。男孩很爱他的爸爸,每次爸爸出门时,他总是依依不舍,眼里噙着泪花。爸爸总说:“男子汉要坚强,可不许哭鼻子。”男孩听了,点点头,默默擦去眼角的泪。在他心里,父亲就像一座山——巍峨、坚毅,稳稳地撑起一片天。

爸爸走后,男孩每天都要跑到大大路口,看着公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,一看就是很久。

此刻,男孩努力睁大双眼,紧紧追随着每一扇掠过的车窗——也许,爸爸就在其中。恍惚间,父亲魁梧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,那爽朗洪亮的笑声又在耳畔回响,还有他用浓密的胡子轻轻扎着自己脸蛋时,微微刺痛却又温暖的感觉又回来了。

妈妈走到男孩身边,唤他回家吃饭。男孩摇摇头,说还没看见爸爸呢。妈妈轻轻叹了口气,脱下自己的外套,披在他小小的肩上。然后,她挨着孩子坐下来,一起看起了汽车。

不知什么原因,车流渐渐慢了下来,终于停滞不前。隐约听到前方有人喊:“前面堵车了。”

男孩的眸眸倏然被点亮,他跳起来,拉起妈妈的手,朝着公路那头跑去。他们挨个车窗仔细张望,期盼能在某一扇窗里看见父亲的身影,然而映入眼帘的,却是一张张陌生的脸。突然,一个身材魁梧、胡子浓密的司机跃入孩子的眼帘——那模样像极了爸爸。男孩脱口喊道:“爸爸!”

司机闻声转过脸来,男孩才发觉认错了人。他的脸霎时红到了耳根,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,连忙改口:“叔叔……不好意思,我以为您是我爸爸。”司机和藹地笑了笑:“没关系,孩子。也许你爸爸就在前边呢。”

男孩和妈妈点点头,继续向前走。二十分钟过去了,男孩依旧没有找到爸爸。就在这时,车队缓缓动了起来。他眼睁睁地看着一辆又一辆汽车从面前驶过,却始终不见父亲的身影。男孩难掩失望,愣愣地站在原地。

天色渐晚了,妈妈轻轻拉起他的手往家走,温和地说:“我们先回家吧,饭菜都要凉了。你爸爸不在这趟车队里。”

家门口立着一个人,男孩一眼就认出了那是爸爸,那高大的身影他再熟悉不过了。“爸爸!”他喜出望外,飞奔而去,爸爸也快步迎了上来。一双大手张开,将男孩高高举起,又在他脸上结结实实地亲了一口。妈妈又惊又喜,轻轻拍了一下孩子的屁股,说:“快下来,让爸爸歇会儿。”可男孩紧紧搂住爸爸的脖子,怎么也不肯松手,仿佛一松开,爸爸就会离开。

妈妈嗔怪道:“我们就在堵车的路上找到了你半天,怎么连人影都没瞧见?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?”

爸爸笑着解释:“活儿提前干完了,就想着早点回来,给你们一个惊喜。我没走大路,是从小路绕回来的,刚到家不一会儿。”

妈妈这才恍然大悟:“怪不得没看到你呢……这次回来了,可得多住几天。”

爸爸点点头,目光温和。晚霞落在他们身上,只剩下满满的甜蜜。

翌日清晨,妈妈起了个大早,去菜市场买菜,想着要好好张罗一顿团圆饭。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喊她,她回头一看,原来是陈医生——丈夫的老同学。陈医生说:“张华的病好点了吗?”她怔了怔:“什么病?”陈医生说:“怎么?你不知道?他昨天刚在我这儿看过病,他的胆囊炎已经挺严重了。”

她听了,匆匆赶回家中。儿子还在睡梦中,却不见丈夫。忽然,她看见桌上放着一张字条:“刚接单位通知,有紧急任务,我已归队。勿念,保重。”

她急忙冲出家门,一直追到大大路口,丈夫早已不见踪影。她站在寒风中,强忍着眼中的泪水。她明白,丈夫向来很要强,为这个家,他付出了太多,却从来不说苦和累。他总把快乐带回家中,尤其在孩子面前,他必须更勇敢、更坚强,就像一座山一样永远不倒。



旧事

远去的炕笼

黄燕妮

元旦返乡,连日暖阳倏忽退场,寒气骤生,浸得人骨头缝都发凉。老爸翻出搁置许久的炕笼,铲上灶膛里烧红的木炭递给我提着,一缕温温的烟火气裹着暖意,瞬间从指尖漫遍全身,妥帖又舒心。

这份暖,一下子勾连起满是烟火气息的童年记忆。我的冬日念想,从来都与这竹编炕笼紧紧相依。它是乡里人独有的冬日暖物,名字直白亲切,模样朴素却藏着巧思。

炕笼以细竹条编成外壳,敞口边缘特意用粗些的竹条编出精巧花纹,既结实耐用,又能稳稳卡住内里的铁皮内胆,不晃不脱。竹制提手被反复摩挲得溜光水滑,泛着温润的竹光。铁皮小盒专用来盛炭火,使用时在盆底铺一层草木灰,隔热又保温,放上几块烧得通红的木炭,再薄覆一层细灰,融融暖意便从缝隙缓缓透出。为防止烧坏衣脚,笼口还会加一层铁丝网,炭火温温不烫手,暖意却丝丝缕缕渗透进骨子里,混着草木与烟火的清浅气息,这份踏实的暖,是空调永远烘不出来的。

从前,炕笼是家家户口的必需品,更是我们上学的取暖标配。那时的冬天,仿佛比现在冷上几分,我们穿着松松垮垮的旧棉袄,袖口下摆都磨得发亮。教室里的窗户没有玻璃,糊着的旧报纸总破着几个洞,寒风直往里灌,吹得人手脚冰凉,唯有脚边的炕笼,是独属于自己的一方温暖天地。

那时的炭,多是砍山上质地坚硬的柴烧成的,却终究不耐烧,往得到下午放学,炭火便烧化殆尽,炕笼也凉了。爷爷便找来刚榨完茶油的茶麸烧透成炭,茶麸质地坚实,火力绵密又格外耐烧,成了炕笼里最好的燃料。清晨从灶膛夹几块烧红的茶麸放进炕笼,覆上一层细灰,一路提着上学,待到下午放学回家,炕笼依旧温热,还萦绕着淡淡的茶油清香,沁人心脾。

在朱山背小学的日子,是炕笼记忆里最鲜活的篇章。老师在讲台上讲课,我们的心思却早早飘到脚边的炕笼上,偷偷从家里揣来的红薯,轻放在铁丝网上,不多时,红薯的甜香混着茶油和炭火的气息,丝丝缕缕在教室里散开。寒风冻得我们鼻涕直流,可那诱人的甜香早已在抵挡不住,起初有人忍不住偷吃,被老师逮个正着,免不了被点名批评,数落几句“上课不专心,就惦记着吃”,羞得我们满脸通红,却终究管不住馋虫。

如今,糊着报纸的窗,跨越“三八线”的烤红薯、满教室的唧里唧里声,都随那缕茶油香,封存在了炕笼的旧时光里。空调、取暖器早已走进寻常人家,炕笼也悄然退出了岁月舞台,可那份裹着草木烟火、藏着年少嬉闹,又浸着爷爷心意的暖,终究无可取代,成了时光赠予我最珍贵的念想。

生活家

守着一盆水仙过冬

夏见

书房案头,一盆名叫金盏银盘的水仙,已经葱葱郁郁、含苞欲放了。

今年冬天冷得早,农历冬月初,风就带了刀锋似的锐气。阳台上的三角梅、茉莉、金盏菊,都瑟缩着褪了颜色。我照例去老街的花市,买了几头水仙回来。

守着一盆水仙过冬,是我多年来的习惯。

初种的水仙,连着一周都在陶盆里静静地立着,天天浇水却不见动静。而当第十天清晨去换水时,忽然瞥见其中最大的那颗水仙头,顶端裂出了一星鹅黄。那黄极小、极嫩,怯生生的,就如雏鸟初探世界的模样。当时,我的心,不禁跟着那点儿鹅黄,轻轻动了一下。

正是这点嫩黄,像冬日阳光,带着薄薄暖意,自此变化接踵而来,不断萌出的嫩芽,见光就长,见风就绿。芽尖一天天拔高,舒展成扁平的叶鞘,又从鞘中抽出真正的叶子。那叶子窄窄的,挺挺的,像孩童手里的绿剑。吸饱了水分的鳞茎,越发水润饱满,像是攒足了旺盛的力。特别那根须,起初只是羞怯的几缕白线,不几天便繁茂成簇,缠在卵石间,雪白如棉。

对水仙,我最喜欢它们的野趣和冬日里的生机,从不加以刻意束缚,任其自然生长。每天早晚,观察水仙的生长,是我最快乐的事。看它们在盆里亭亭而立,绿得那样理直气壮,仿佛窗外的严寒与它们全然无关——这份坚毅的气质,就让人感到一股踏实的力量。

我和同桌牛牯,先前还在桌子上划了深深的“三八线”,互不相让,此刻划出搁置许久的炕笼,只得火速达成联盟,约定两人轮流放哨。一人紧盯讲台,眼睛一眨不眨,见老师转身板书,立刻压低声音急喊:“快!快吃!”

另一人便飞快伸手,抓起铁丝网上滚烫的红薯咬一大口,囫圇吞枣在嘴里,烫得舌头打转,腮帮子鼓胀,龇牙咧嘴也不敢出声,只使劲憋着气往下咽。若是老师突然回头,放哨的人立马咳嗽一声示警,偷吃的人便火速把红薯塞回原位,端正地坐好,装作认真听课的模样,嘴角却偷偷沾着红薯焦屑,心底憋着满满的窃喜与慌张,即便挨过老师的骂,这份冒着被批评的风险、跨越“三八线”共享的甜,成了课堂上最隐秘的欢喜,如今依旧是我们相见时最美好的回忆。

有时我们也烤豆子、烤玉米,干瘪的豆子遇热“啪”一声炸开,像放小鞭炮;玉米烤得焦香,炸开时唧里唧里响成一片,在安静的教室里格外醒目。老师总会无奈转身,拿着教鞭敲敲黑板嗔怪:“安静!上课呢!”我们便赶紧捂住嘴,把头埋在臂弯里,肩膀一耸一耸地偷笑。

课间的欢乐,更是热闹非凡。我们在教室墙角玩“挤油”的游戏,你挨着我,我靠着你,脚足了劲往中间挤,挤得浑身发热,鼻尖冒汗,寒意尽数消散,才肯嘻嘻哈哈散开。跑回座位第一件事,便是小心翼翼将炕笼里的灰再盖得严实些,护住炭火不被风吹,这样便能稳稳烧到放学,回到家里依旧暖暖融融的。

偶尔有人的茶麸炭没烧透成了黑炭,便向同桌“借”一点红炭来抡炕笼。抡炕笼可是十足的技术活,弄不好炭火和灰烬会全部洒出来,烫到手脚肉,惊险得很。大家总会把目光投向铃子,班里就她抡得最溜。只见她一手攥紧提手,胳膊飞快地画着圈抡动炕笼,像耍杂技一般,借着风势,黑炭竟“呼”地一下重新燃得通红,火星点点翻飞,宛若舞起一条小火龙,引得我们围在一旁拍手叫好,惊叹不已。

如今,糊着报纸的窗,跨越“三八线”的烤红薯、满教室的唧里唧里声,都随那缕茶油香,封存在了炕笼的旧时光里。空调、取暖器早已走进寻常人家,炕笼也悄然退出了岁月舞台,可那份裹着草木烟火、藏着年少嬉闹,又浸着爷爷心意的暖,终究无可取代,成了时光赠予我最珍贵的念想。